



孙孝恩 著

光緒評傳

光 绪 评 传

孙 孝 恩 著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1985年·沈阳

光绪评传

孙孝恩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字数: 256,000

开本: 850×1168 $\frac{1}{32}$

印张: 11 $\frac{1}{2}$

印数: 1—55,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秉忠

责任校对: 文 慧

封面设计: 金 鸣

统一书号: 11371·1

定价: 2.20元



光绪皇帝



珍妃

康有为



翁同和



譚 嗣 同



林 旭



榮 祿



慈禧太后



奕 劼

目 录

第一章 年幼即帝位	1
一、出生在没落的王朝.....	2
二、被清廷矛盾的漩涡卷上皇帝的宝座.....	9
三、小皇帝的境遇.....	17
第二章 初露头角	30
一、东太后的暴死.....	30
二、初露头角.....	35
三、傀儡地位的确定.....	41
第三章 大婚与“亲政”	47
一、后、妃的选定.....	47
二、大婚与“亲政”.....	56
三、所谓的“后党”与“帝党”.....	63
第四章 在甲午风云中	84
一、在严重的战争威胁面前.....	84
二、复杂的考验.....	91
三、力排备战干扰.....	98
四、推进抗战进程.....	103
五、在危难的日子里.....	110
六、尖锐的课题.....	122
七、“难言之隐”.....	130
第五章 不做亡国之君	143

一、严峻的岁月·····	143
二、无限的忧虑·····	147
三、睁眼看世界·····	158
四、顺应时代潮流·····	165
五、不做亡国之君·····	174
第六章 毅然变法革新·····	174
一、颁诏“定国是”宣告变法革新·····	179
二、召见康有为议定变法方略·····	186
三、一个近代化蓝图的诞生·····	196
第七章 新旧势力的拼搏与变法的夭折·····	215
一、艰难的起步·····	215
二、变法改革全面受阻·····	224
三、力挽狂澜·····	236
四、向改革的纵深推进·····	249
五、最后的较量与变法的夭折·····	268
六、业绩与教训·····	288
第八章 无尽的悲愤·····	294
一、不带枷锁的囚徒·····	294
二、在国家存亡的关头·····	306
三、饮恨而终·····	322
附录：光绪皇帝经历记要·····	333
后 记·····	350

第一章 年幼即帝位

一、出生在没落的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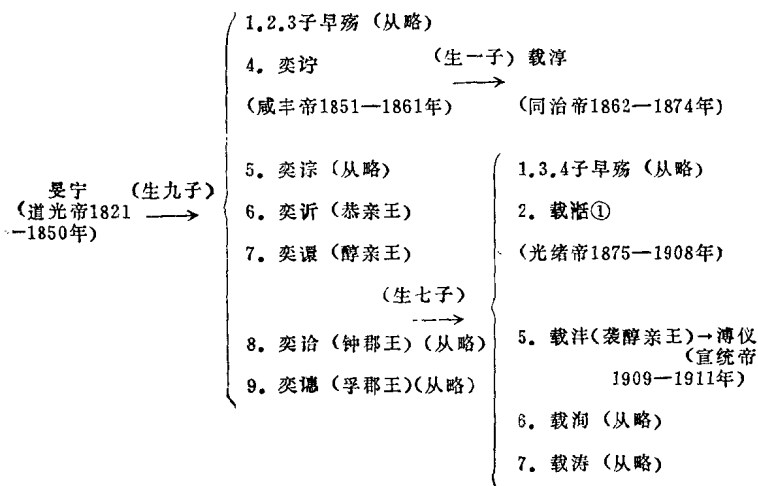
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即帝位后的年号为光绪，因此在历史上又把他称为光绪帝），庙号为清德宗景皇帝，于1871年8月14日（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的醇王府。^①

载湉的生父，是清王朝皇族的嫡系、道光皇帝旻宁的第七子醇亲王奕譞。他的生母，是西太后的胞妹叶赫那拉氏。关于载湉的家系，参见下页简表。

说到奕譞，在当时的清廷宗室中确实有点特殊的来头，这与他的儿子载湉所以能够在后来登上皇帝的宝座，是不无关系的。在奕譞之兄咸丰帝统治时期，除了按照清廷宗室的惯例，他被封为属于二等爵位的醇郡王之外，按照溥仪所说，奕

① 关于光绪帝的生年，在有的论著中记为1872年。查《清史稿·德宗本纪》云：载湉于“同治十年六月诞于太平湖邸第（即醇王府——引者）”；（《清史稿》，第四册，第851页）在朱寿朋编的《东华续录》光绪1中更具体地说：“同治辛未（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子时诞上（光绪帝）于太平湖邸第”；《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第1页也记述，“同治十年辛未六月二十八日子时，诞上于太平湖邸第。”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亦云，载湉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诞于宣武门内西太平街醇王府之槐荫斋。”（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72页）。上引资料有的是清代档案性官书，又都一致地载明，光绪帝载湉系出生于1871年8月14日（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笔者认为，此说当为可靠。

载湫（光绪帝）家系简表



璦在那时并没有再得到过什么其他的“恩典”。不过，到咸丰十年（1860年），奕訢“奉旨”与受到咸丰帝宠爱（已经晋级为仅次于皇后）的懿贵妃（即后来的西太后）之妹成了亲。在封建专制时代，除了血缘关系之外，这种裙带关系也往往在政治上发生作用。当然，这种作用是有一定条件的。

1861年（咸丰十一年）秋，昏庸腐朽的咸丰帝在内外交困中忧郁病死，其幼子载淳继承了帝位，改明年为同治元年。正在这时，刚刚因为儿子继承帝位而与咸丰帝的原皇后钮祜禄氏“并尊”为皇太后的叶赫那拉氏（钮祜禄氏，徽号简称慈安；叶赫那拉氏之徽号简称慈禧，因其在宫中居处不同，则又分别称其为东太后和西太后。再者，钮祜禄与叶赫那拉均是满族中

① 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说，载湫是奕訢的“长子”。《清史稿·奕訢传》中说，载湫是奕訢的“第二子”。爱新觉罗·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一书里也说，奕訢的长子“早殇”，载湫是其“第二子”。并参照其他材料证实，载湫是奕訢的“第二子”之说为确。

的支族名称，如此称谓不便与其同族中的他人区别；慈安、慈禧，又是清统治者授予的尊号。因而在此后，把他们俩人分别称为东太后和西太后似较适宜），与东太后谋定，并与留守北京的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訢相串通，乘机发动了宫廷政变，遂即两太后以同治帝年幼进行“垂帘听政”的方式控制了清廷政权。西太后得势以后，奕訢也官运亨通起来，给他加上了“一大堆头衔”，管理清廷的军政要务。1864年（同治三年），西太后赐予奕訢“加亲王衔”，到1872年（同治十一年），奕訢又被正式封为清王朝宗室的一等爵位“醇亲王”，成了西太后班底的一大砥柱。

奕訢所以在西太后当政以来，倍受信宠，其地位扶摇直上，当然不能说这与他和西太后有着裙带关系丝毫不关，但是主要的缘故，还是由于在1861年宫廷政变中，奕訢也一头扎在了西太后的一边，他曾亲自参加了捉拿西太后的最大政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的活动，为西太后镇压政敌，夺取王朝政权立下了汗马之功。^①从而，奕訢便以这位新太后的一个“最靠得住的附和者”^②受到了格外的器重。

载湉出生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正是清王朝统治者做着“中兴”迷梦的时期。可是他们所鼓吹的这种“中兴”，并不是说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得到了复兴。

在此之前，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给我国套上了条条奴役性的侵略锁链，把我们古老的祖国开始拖向半殖民地的泥潭。但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全国各地仍是烽火连天，尤其是席卷全国半

① 参见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5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07页。

壁江山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逐渐渡过了由于自身矛盾所造成的困境，在一些方面又出现了新的势头，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在国内还处于严重的危机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侵略者又很快地意识到，要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扎下他们的侵略脚跟，必须“支持和加强清廷而不是听任帝国（指清王朝——引者）在叛乱（指人民的起义斗争——引者）之中分崩离析。”^①于是，英、法、俄、美等国侵略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立即转过身来，公开站在了已陷入革命烈火之中的清王朝统治者一边，共同对付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中国各族人民起义了。到载湉出生的1871年前后的同治年间，原来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的清朝统治者，在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下，继续杀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之后，又先后扑灭了其他各族人民的斗争烈火，使他们暂且解除了灭顶之灾，又取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这就是清朝统治阶级所谓的“同治中兴”的由来。

把举国翻腾、连绵多年的人民起义浪潮基本平定下去，这对清王朝统治阶级来说，的确是来之不易！而这种充满血腥的“稳定”局面所以取得，外国侵略者“出力不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也没有白费气力，他们在支持清王朝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也捞取了高昂的代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在这期间得到了迅速地落实。从1861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负有特殊使命的“公使”，终于冲破了清朝统治者的“防线”，先后进驻了北京，这就为外国侵略者干涉中国的内政、外

① [美] 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313—314页。

交和进行政治渗透提供了条件。并且任用外国人，以清政府官员的身份控制中国海关的情形也正式形成了一种制度，在中国各主要的“通商”口岸广泛推行，加上外国人在中国享有低关税等特权，又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进行经济侵略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适应着外国侵略者的要求，专门承办所谓“外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于1861年在清政府中央作为一个新的重要机关设立了。事实上，这是清王朝统治者所采取的与外“使”驻京和贯彻不平等条约相对应的措施。

另外在此期间，在清王朝统治阶级当中，也出现了一个从上到下力图与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局”，大肆鼓吹中外“和好”的政治势力。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政治势力的突出代表，在清中央，便是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席大臣的恭亲王奕訢等；在地方，即是通过在外国侵略势力支持下镇压人民起义发迹的地方实力派首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实际上他们是在清王朝当权者之中较早地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那一部分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震慑于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之下，又在镇压人民起义当中尝到了外国的洋枪、洋炮的“甜头”。这些人正是从外国侵略者那里受到了“启蒙”，无可奈何地意识到，继续照搬这个王朝库存的陈货来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已无济于事了。于是，他们极欲在和列强尽量维持“和局”的前提下，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的军事及生产技术，来修补千疮百孔的王朝躯体以维护其封建统治。恰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人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便先后揭起了“求强”、“求富”的旗帜，办起了一些军事和民用性企业，并用从外国买来和自己仿造的洋枪、洋炮及近代舰船装备了部分陆海军。在当时，社会

上的人们把从事带“洋”性的活动都叫做“办洋务”，因而后来的人们便把这些进行“洋务”活动的人称为洋务派，并对它赋予了特殊的含义。

那些主办洋务事业的大官僚，在其主观上绝不是要把中国引向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当然，如说有的人想与外国争得“一席之地”来扩充自己的实力或许较为妥切），至于他们在政治立场上的反动性也从未发生变化。但是，从其思想上的一个侧面来看，这些人又与那些“恶西学为雠”、坐井观天的封建顽固人有了一定程度的区别，他们毕竟看到了，再原封不动地按照原来闭着双目走路的版眼混下去已是不可能了。特别是，这些人在经济、文化领域里，也主张在一定的范围内吸取一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这在当时，对于正要破土而生的本国资本主义无疑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导发作用。

然而，洋务派大官僚，却把他们从事的这种“求强”、“求富”活动立足在与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局”的基点上。十分清楚，在世界列强正疯狂地推行侵略政策的年代里，在被侵略的中国持以这样的立足点，不仅是一种赤裸裸的幻想，而且它必然导致在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事实上，尤其是作为一个后起的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在1870年被补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这个经管兵事和外交的要职之后，接着在1872年又给加上一个显赫的大学士头衔。他在对外方面，又极力迎合封建顽固势力的愚昧心理，采取了对侵略者妥协的方针。因此，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清王朝逐步出现了一个力主对外一味妥协的政治势力。这种情形的出现，标志着到这期间，清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也发生了深刻的分化。

自从1862年同治帝继位以后，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在表面上是由东、西“两宫”皇太后以“垂帘听政”的方式所控制，

但在实际上这个王朝的大权却逐渐地被西太后独揽了。①

西太后控制了清王朝的时候，中外之间，在表面上固然出现了暂且“相安”的情形；国内人民起义的波涛也相继转入低潮。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渗透和扩张，却在日益深化。同时，苦难深重的国内各族人民，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又继续展开了新的斗争，各阶层人民群众发动的反“洋教”斗争星火，逐渐在全国广阔的区域里蔓延，预示着在中国的大地上又在酝酿着新的斗争风暴。在此期间，在国内思想、经济领域里新与旧的矛盾亦日趋尖锐。从国家总的形势来说，却从此进入了一个急剧转化、动荡的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新得势的清王朝最高的实际当政者西太后，她又是怎样动作的呢？

一方面，在如何对待外国侵略者和国内人民起义的问题上，西太后也采取了宁肯投靠外国侵略者，也毫不对国内人民

① 关于东、西两太后的个人关系传闻颇多，在包括清王朝在内的历代封建王朝的内部，皇亲以及后妃之间，争权夺势、勾心斗角之事在在皆有。至于在清王朝从同治帝继位以来，东太后与西太后联合“垂帘”操政时期，他们俩之间的矛盾也时有表露，不过从各种情况来看，对于权势东太后确实不如西太后那样的迷恋。在阴险狡诈、玩弄权术方面，西太后更远远超过了东太后。据说对此情形，咸丰帝生前就有所察觉，为防止在他死后那拉氏“恃尊跋扈”，曾秘密地给钮祜禄氏留下一道以备将来惩治那拉氏的亲手谕，从而后来出现了东太后受骗烧此密谕的传说。这件事究竟确否，对此宫廷中的齟齬事我们姑且不论，但西太后贪恋权势，野心勃勃，惯于施展诡计是不可否认的。据《清史稿·慈禧传》中记述，当时“虽东西两太后同训朝政，而实则处分〔理〕一切，仍以西后意为可否”而定。卡尔女士写的《慈禧写照记》一书也说，“东西两宫同时秉政之日，其所谓一切国家之实权，皆由慈禧太后操之，慈安太后不过垂衣裳而治而已。”说到怎么形成西太后专权的局面？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一书中说，“西宫太后性警敏，锐于任事，太后（即东太后——引者）悉以权让之。”在《清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中同样记云，当时东太后“于用人行政，悉以权让之慈禧太后，不轻发言。”究竟是东太后向西太后“让”权；还是西太后专横揽权？也无须深究。总之，从1862年同治帝继位以来，西太后逐渐控制了清王朝的最高权柄，这是历史事实。

起义让步的反动政策。早在她夺取了清王朝统治权的初期，她就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在批示江浙地区一些反动官绅请求“借英、法官兵剿‘贼’”时，即明确地说，“但于剿‘贼’有裨〔益〕，朕（即西太后——引者）必不会遥制。”而且她还强调指出，“其事后（即联合镇压人民起义之后——引者）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①正是在西太后的同意和授意下，首先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全面地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局面形成了。随后，其他各地的各族人民起义也遭到残酷的镇压。在这一罪恶的交易过程中，外国侵略者也真的得到了重重的“酬谢”。很明显，不论是奕訢、曾国藩、李鸿章还是西太后，他们都把国内的人民起义视为“心腹之患”，以为屈从外国侵略者，仍可保住其统治地位；如果容忍人民起义，他们将有灭亡之危。所以，在敌视人民起义和屈从外国侵略者方面，西太后与李鸿章等新官僚都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声震动下，就有人从沉睡中惊醒，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以便抵抗外国侵略者。到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外国资本主义步步深入侵略的刺激下，要求改变祖国落后状态的呼声，在社会上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传播。到这期间近代资本主义的幼苗，终于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生了，我们古老祖国的身躯也开始披上了时代的新装。可是，身居清廷最高权位的西太后，完全承继了封建愚昧、陈腐的观念，始终抱着“我爱我们的老样子”的信条，把一切新生事物均视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卷，第3页。